

潛在的核擁有與戰後國家

活著的廢墟：福島核電站——從原子彈爆炸談起

武藤一羊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還在不停地排出放射物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中，有某種意志存在著並發揮作用。這並不是比喻，實際上，這個活著的廢墟已經成了建立並支配核電站體制的人們的意志的結晶，並成了他們在此基礎上長期活動的一種物化的形態。這種意志在核電站體制的統一支配之下，被以清潔的能源、以及對未來的美好承諾等面紗所覆蓋。我們不斷地被告知，如果沒有了核電站，就不可能承受電力的大量消耗，不可能有便利的能源，也不可能有繁榮可言，而我們——社會的多數派——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但是現在，核電站已經變成了對環境造成無限污染、持續侵害人的生命、而且無法輕易殺滅的兇惡生物，它的本來面目和起源也隨之暴露無遺。

對於原子能發電這一事物在根源上的兇險性，長期以來，我並未有充分的意識。我雖然不是反原子能發電運動的活動家，但從 70 年代開始對反核能發電的居民運動產生了共鳴，做了一些把這一資訊傳遞給國際社會的事情，參加了相關的遊行，也發表了一些言論，宣導建立一個與以往的以開發和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社會相對立的共生型（alternative）社會。但是，3·11 地震海嘯造成的日本東北沿岸社會（community）的徹底破壞和大量的死亡，卻使我看到因東電公司福島核電站的崩潰而逼近的現實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這使我遭到了沉重的打擊。這很顯得有些狂妄、不知分寸甚至愚蠢可笑，因為我本人並沒有在地震中受傷，房子也沒有倒塌，卻在這裡說什麼“受到沉重的打擊”。但是，在這次的大災難與政權的低劣、處理的無能相疊加所造成的事態發展當中，我感到了一種社會全面崩潰的危機。

這雖然不是戰爭，但是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深淵——本來被作為自明的前提的自然和社會的秩序開始從腳下崩裂的深淵，從這一點來看，它與戰爭——而且是核戰爭——相連接。已經有許多的居民被推落進這個深淵。對於那些從福島的受輻射地區撤離、被迫拋棄家園拋棄城鎮避難的人們來說，他們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自然和社會的組織遭到了致命的破壞，從腳下開始崩裂塌陷。而且，由於是核污染，破壞的過程所造成的災害並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會以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為單位持續下去，一點一點地擴大，侵蝕著自然和社會。如果是自然災害的話，還可以通過災後重建進行復興。但從規定了這次災害整體性格的福島核電站的悲慘結局來看，同樣意義上的重建是不可能的。由於放射性污染會對人類以及環境持續施加事實上是永遠延續的污染和腐蝕作用，因此其破壞是不可逆的。放眼望去，在日本列島的大部分海岸線上密密麻麻排列著 54 個核電站和再處理設施，這一事實表明，有朝一日使日本列島上社會組織的存續本身變得不再可能的事態，並非沒有可能出現的可能。

即便如此，人們（我們）一定會活下去，重建社會，徐圖復興的吧。但我卻要拒絕這一啟示錄般的遐想。這一點在廣島、長崎、南京、切爾諾貝利、法魯加、越南、柬埔寨、以及前南斯拉夫身上都得到了證實。但是這與政府以及媒體的“來吧，讓我們踏上復興之路！”的呼籲造成的局面的轉換並沒有關係。如果災後的重建沒有與破壞及解體的性格、災難性結局的嚴重程度相符，那麼“復興”將會以把危機埋入地下、以謊言覆蓋真實的形式推進。將危機埋入地下，一定會通過災難受害者的分離、非當事人化和生活實態的不視覺化來進行。這一災難已給太多人造成了各種形式和程度的傷害與破壞。受災者才是在根本上具有決定權

的當事人，只有他們不斷地站出來，災後復興才真正談得上有希望。在發生了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後，雖然污染在無止盡地蔓延，受災範圍在無限地擴大，但由於其中存在著一種以東京的過度消費和福島的犧牲為支撐的中心 vs. 周邊的結構，因此就需要一種能打破並跨越這一障礙、將這一關係轉變為公正的關係的能動的作用——社會運動，這就是當事人化。當事人中的當事人從周邊發出來的聲音，是其中起主導性作用的力量。只有以當事人的生存權、否決權、決定權的行使為基礎，重建才有可能。能否在“收拾”、“復興”的呼聲中將力量落實到救助物件的立場上，打破試圖非當事人化的勢力，這是圍繞著災害問題進行鬥爭的核心的內容，也是形成對峙的戰線。在這一對峙中，不是只有受災者才是當事人，將吸納了原子能的社會作為當然的事物接受下來的所有人，都承擔著決定是否使這一狀態持續下去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都應當作為當事人站出來。

這一戰鬥能否取得成功，就取決於這些以複合方式構成的眾多當事人，在孕育了矛盾的動態的過程中能否攜起手來，抓住危機的根本要害，並挖出其病根。

3·11 以後的事態已經充分證明，在原子能發電這一事物當中蘊藏了社會性解體的危險。也就是說，原子能發電已經不再是作為探討能源政策時的一個選項、缺乏能源的日本所必需的動力源、或是維持國際競爭力這一議論層次上的事物了。

核電站必須無條件地廢除。

如果是這樣，那馬上會浮現出來的一個疑問，就是這種事物最初為什麼會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來。尤其是在地震多發國家的日本，海岸線上竟然並排聳立著這種事物達 54 個之多，這種有悖常識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許多的書籍和論文已經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解釋和說明，我也並非這個領域的專家，但是由於長年來一直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審視戰後日本這一國家，我感到有必要以我自己的方式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對於日本的原子能發電問題，我將不是從能源問題或是環境問題的角度，而是把它與戰後日本國家的建立這一問題關聯在一起進行討論。對於已經成為爭論焦點的廢除原子能發電這一當前不可回避的課題，我也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探討它的意義。儘管有些迂回，但讓我們從一個較舊的話題開始探討。

與原子能發電的奇妙邂逅——1957 年的廣島

最近我才意識到，在還沒有意識到以上問題的情況下我與核電問題的最初相遇，是在 1957 年。那一年的年初，我作為剛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廢核協議會（簡稱“日本原水協”）國際部的事務局員工，正在為 8 月在東京召開的第三次廢核世界大會緊張地做著準備和推進的工作。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從朝鮮戰爭下從事看不到光明和出路的運動、突然轉向了充滿光明和生機的活動場域年輕社會活動家而言，這真是一項極其有價值的工作。在美軍結束對日佔領的兩年以後，1954 年 3 月，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環礁進行了氫彈試驗，試驗產生的死亡之塵飄落在日本的金槍魚捕魚船福龍丸第五號上，船上的人員引致遭到核輻射。對此，東京杉並區的主婦們自發地發起了禁止核子試驗的簽名運動，這一運動瞬間遍及全國，並與廣島的運動相匯合，發展成為廢除氫彈的大型運動。（藤原、丸濱）運動的成員從自民黨到社會黨、共產黨、地區婦人會與青年團，從學生運動到勞工運動，最終發展成為一個與平等的訴求相關聯的、名副其實的超黨派大型運動，共徵集了 3200 萬人的簽名。這一運動於 1955 年和 1956 年分別召開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廢除核武器世界大會，在會上，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首次公開發言，向世界呼籲廢除核武器。對核武器受害者的救助也被採納為運動的課題。我是從第三次大會開始參加大會組織的。大會在東京召開，之後外國代表開赴廣島、長崎，為了協助他們，我第一次踏上了廣島的土地。

借著這個機會，我第一次參觀了原子彈爆炸資料館。展覽給了我極大的衝擊。展現廣島

整座城市被原子彈轟炸情景的立體示意圖位於大廳的中央。沿著稍嫌昏暗的通道，依次展示著遭受原子彈爆炸輻射的受害者的照片和遺物，原子彈造成的大屠殺，以一種壓倒性的、令人窒息的現實感撲面而來。但是在這條通路的盡頭，卻有另外一個展室。穿過一道門後燈光突然變得異常明亮起來，使人眼前出現一片陰翳。說明上寫著，這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展覽先是告訴你——原子能是偉大的科學發現、人類的未來會因原子能而愈加開闊，其後是一幅幅色彩華麗的展板，用圖畫來講解處理核物質的機械手模型、原子能飛行器、原子能船隻、以及原子能發電等。從昏暗的原子彈爆炸的展室走進來，有一種強烈的不協調之感。就像是另一個世界。原子彈造成的無情大屠殺以及原子能許諾的光明未來，借著這一扇門之隔，被捏合在了一起。幾乎使人目眩。

這就是 1957 年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但是，儘管感到了這種不協調之感，但當時我並沒有試圖去分析其中的意義。當時的我投身於廢核運動這一和平運動中，不管是原子能還是別的什麼，不是炸彈的都被我排除在了關心範圍之外。

為什麼在原子彈爆炸資料館裡有一個“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呢？我知道其中的緣由是在很久之後。在我參觀資料館的前一年，也就是 1956 年，在廣島舉辦了一次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博覽會，其會場就選在了和平紀念公園內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為了給巨大的展示物騰出空地，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展示物被全部移了出去。1956 年是廢核運動大有進展、組織漸趨完備的一年。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覽會被搬到了廣島，擠走了原子彈爆炸的展示品，在原子彈爆炸資料館裡得以召開。後來我才知道，在博覽會結束之後，和平利用博覽會的一部分展示品被“捐贈”給資料館，為了容納這些捐贈品而特別設置了一個單獨的展室。1957 年我所見到的就是這些展示物。

這些經過，我是從廣島廢核運動的領袖、也是其精神和思想支柱的森瀧市郎的著作（森瀧，1994，以下對森瀧的引用皆出自此書）中得知的。自身即是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倫理學家森瀧在書中引用了自己的日記，帶著深切的自省，對“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如何被搬到了廣島、以及廣島人作出了何種反應做了如下敘述。

“我在廣島全面地接觸原子能發電的問題，是在 1955 年（昭和 30 年）的 1 月末”，森瀧寫道。那年的 1 月 27 日，美國民主黨的眾議院議員耶茨在議會上提出了在廣島建設核電站的決議案。（田中，2011）這個消息給廣島市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引起了強烈反響。2 月 5 日的《中國新聞》報導稱，關於這一決議案，耶茨在給原子能委員會及艾森豪總統的書信中提出，1、將廣島作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中心；2、廣島的核電站在 3 年以內投入使用；3、最初是計畫建設醫院以救治至今仍需治療的 6 千名原子彈受害者的，但建設核電站更加有用。

森瀧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1 月 28 日（星期五）的日記

“……晚上，廢核廣島協議會常任理事會。……美國眾議院議員耶茨提議應在廣島建立核電站的報導出現在今天早晨的報紙和廣播中，我們對此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最後，我們決定向市民發出揭示其中問題點的聲明書。起草委員：渡邊、森瀧、佐久間、田邊、迫。”

起草發表的聲明書中列舉了原子爐有轉用為原子彈製造設備的可能、原子爐所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極有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其運營會使日本受制於美國、一旦發生戰爭廣島將會成為最先受攻擊的目標等理由，指出我們希望應首先對受原子病痛折磨的數萬廣島市民在治療、生活兩方面給予完全的補償。《中國新聞》將其作為“核電站反對聲明”做了報導。但是，森瀧回顧道：

看到這一聲明的濱井市長沒有掩蓋他的困惑和失望。見到他的時候，他對我說，“在報紙上看到那篇聲明的時候，我不禁想，‘這可糟了！’”本來正岡邁克（注一）真的是出於好意才運到那裡去的。”

濱井市長在報紙上談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是我從去年開始向美國呼籲的，特別是去年訪美的時候，我把此事也向正岡邁克提過。他的積極活動終於結出了果實。但是，微量放射能所帶來的壞影響如果不解決，就不可能有和平利用。但不管怎麼說，能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對死去的犧牲者的慰藉。以致死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利用來使人生存，我想市民們會對此贊同的”。……“我相信這是為了生存的、充滿善意的饋贈。”

於是第二年，和平利用博覽會就來了。如果說“在廣島建核電站！”的提議最終只是以一個小插曲而告終的話，那麼和平利用博覽會則是由廣島縣、市、廣島大學、中國新聞社和美國文化中心等共同舉辦的聲勢浩大的正式活動。於是“原子能和平利用”強行擠進了廣島，並待著不走了。市里提出的將原子彈爆炸資料館作為博覽會的會場、將原子彈爆炸的2000件展覽資料全部移至中央公民館的提案，當然遭到了原子彈受害者組織的反對。森瀧這樣寫道：

美國推廣到全世界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覽會，已經在26個國家得以舉辦，觀眾人數突破了一千萬。在日本的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的會場，有近百萬參觀者前來觀看。終於，它也來到了廣島。原子彈受害者的微弱反抗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但是，要把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展品撤出去，把那裡作為博覽會的會場，卻很難不讓人反對。

但是市里說，要是不使用資料館，就得新建300坪的會場，而這需要1000萬元，市里拿不出這個錢，所以沒有辦法，只能在資料館舉辦。

2月10日（星期五）的日記

“……晚上，與市長（渡邊氏）就（為了和平利用博覽會）轉移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資料一事進行談話。市長也覺得撤出資料是不明智之舉。但是，他還是說，由於財政上的問題，現在只能是利用資料館做會場。”

4月25日（星期二）的日記

“……從美國文化中心館長耶茨那裡收到了美國政府的答覆。這是根據3月1日比基尼兩周年集會的決議，向美英蘇三國首腦遞交的呼籲廢除核子試驗的請求書所收到的回復。對日本政府的回答與內容與此基本相同。”

那時，美國文化中心在廣島承擔了“美國大使館駐外機構”的任務。我收到這一答覆的信件之後，對Futsui館長耐心地反復強調，不應該為了做原子能利用博覽會的會場而把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陳列品撤出去，應該充分考慮到遭受原子彈侵害的市民的感情。

“如果我是你，就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我用了近乎強硬的語氣向他說道。而Futsui館長聽後也不再客氣，說“我一定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塗遍整個廣島。”

這些圍繞著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事件發生在1955—1956年，這使我再次感到震動。1955年是廢核世界大會在廣島召開的年份，當時運動蓬勃開展，盛況空前，而1956年是接著在長崎召開第二次世界大會的年度。而就是頂著這種氛圍，“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從外部、由

美國帶了進來。(田中，2001)(加納，2011)

“和平利用”被嵌入了什麼樣的語境當中，在這一過程中已經得到了體現。那是以光輝的“和平利用”對帶來死亡與破壞的原子彈爆炸進行遮蓋並沖銷的語境。“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塗遍整個廣島”，能說出這種話，真有些奇妙的感覺。而且似乎也達到了這樣的效果。反映參觀者感想的《中國新聞》的版面上躍動著“為人類的未來帶來希望”、或是“活到今天真好——驚異之旅”之類的標題，引用的知名人士的談話中也見不到對和平利用本身的批判。各種評論中雖然提出了和平利用要以廢除一切核彈以及對放射病的根治療法的研究為前提、原子爐是否有產生致死灰塵的危險、放射性廢棄物該怎樣處理等根本性的問題，但整體上都在“和平利用”是好事的框架下平息了。(《中國新聞》1956年5月26日、27日)

對資料館長達三周的佔用，是轉換了原子能意義的具有象徵性意味的行為。儘管人們私底下對這一不厚道的行為也會感到不滿，但最終還是都被引向了“和平利用”=好事的陣線。森瀧在日記中引用的當時的濱井市長的那句話——“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對死去的犧牲者的慰藉。以致死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利用來使人生存，我想市民們會對此贊同的”——很有衝擊力。原子彈爆炸越是壞事、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因此更加是件好事，通過這種逆轉或是倒錯的邏輯，人們被誘導至“和平利用”的舞臺之上。這就是之後“原子能是清潔能源、既安全又放心”的印象的原型。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那就是在美國淡化原子彈轟炸、將“和平利用”塗遍廣島的地毯式轟炸的做法與接受方日本的文脈之間，存在著某種出入。《朝日新聞》(2011年8月3日)適時地刊登了“‘在原子彈受害國進行原子能發電’的邏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推進、在根本上是救贖與復仇心”的評論文章，對“正因為是原子彈受害國才更要和平利用”的“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列舉了幾個版本——進行了批判性的探討。

抓住“正因為……才更要”這一邏輯作為問題是恰當的。上面的濱井市長的邏輯就是典型的“正因為……才更要”的思維模式。而且，原子彈轟炸與和平利用之間的這種關聯，在美國一方的戰略性邏輯當中是不存在的。(注二)這種“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我認為它植根於戰後日本得以確立的根本性結構之中——把被原子彈轟炸的體驗當作了被給予的東西來對待。它已經是發生了、無可更改的事實，所以不願再次把它作為討論的物件，被當作了這樣一種先在的東西。在此之上，就開始尋找自初就帶上了正面印象的“和平利用”與遭受原子彈轟炸危害的體驗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其中包含了一種希望二者之間儘量是親和性關係的願望。在這樣的追尋中，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就全部被打包、被抽象化了。因為從每一個人被轟炸的個別體驗中是很難找到通向“和平利用是件極好的事”的道路的。而個別的體驗一旦被抽象化為一個遭到原子彈爆炸的普遍化事件，這種抽象就可以與和平利用建立起關聯。而在其中起捏合作用的，就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這時，把原子彈作為對象來正面面對的通路就被堵上了。到底原子彈爆炸的代價是什麼？為什麼會製造出原子彈這種東西？為什麼在8月6日會有原子彈落下？為什麼會落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到底是誰投下了原子彈？是誰做出了原子彈攻擊的決定？到底那次戰爭是怎麼一回事？是誰發動了戰爭？誰是加害者？誰是犧牲者、在哪裡是犧牲者，等等，進入這些問題的通路都被封閉了。那個時候的“和平利用”也沒有被追問其具體的內容，而是作為正面的價值被抽象化。最終，情緒和道德把認識推到了一邊。

但這也可以算是戰後日本的歷史經驗總結中所特有的模式的一個例子。“戰爭終於結束了，現在已是和平國家了”，或者是“正因為戰爭如此悲慘，今天的和平才得來不易”，這樣一些抽象的、無法再繼續向前推進的命題，將個人具體的體驗吸納於無形，因之阻斷了對活著的歷史進行總結的道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就是這樣一個阻斷的裝置。對這一邏輯運用到極致的是“正因為在戰爭中有數百萬人的犧牲，才有現在日本的繁榮”，這樣

的說法不僅是“靖國派”的論客在使用，也是在 8·15 的政府投降儀式上被宣讀的正式文書等情況下常常被運用的邏輯。“數百萬人的犧牲”（A）與“現在的繁榮”（B）之間到底有何種關聯，並沒有得到說明。但是把肯定性的（B）看作是拜否定性的（A）所賜，就變成了一種應該的道德上的要求強要眾人接受。如果要否定二者間的關聯，等待著的將是一種“你想冒犯死難的同胞嗎”的脅迫。正是這種不以邏輯為媒介的情緒性的結合，成了戰後的日本推卸戰爭責任、免除殖民地責任的最為便利的手段。如果在 50 年代的日本，能夠對投放原子彈等前述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真的追問，那麼以投放原子彈而結束的戰爭的意義——包括日本的加害責任在內、包括使用了原子彈的美國的戰爭犯罪在內——得到全面揭示的通路就會被打開。緊接而來的就會是追究各自責任的過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原子彈的死難者慰靈碑上就不會寫上“請安然長眠 過錯將不會再重複”這樣曖昧其詞的話了。在原子彈與“和平利用”的問題上也就不會出現“正因此……才”的關係了。這裡面潛藏著的，是戰後日本國家確立的問題性這一秘密。

這裡有必要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一表達稍作思考。這一說法在 1950 年代曾被大量使用，之後雖未變成死語，但似乎已很少被使用了。是從什麼時候它的使用頻率開始下降的，我並未做過調查。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無疑，那就是“和平利用”這一說法是與“軍事利用”相對而出現的。正因為原子能首先是以原子彈、然後是氫彈的方式出現的，所以才有必要提出還有不是炸彈、不是“軍事利用”的利用方案。這就是所謂的“和平利用”。只有在這個對比之中，“和平利用”這個說法才具有意義。然而這並不是通常的詞語用法。誰也不會去說“石油的和平利用”。而石油卻是被用作戰鬥機、戰車的燃料、凝固汽油彈的材料，在以一切的形式被用作軍事用途。但是在用於暖氣、發電以及私家車的燃料等途徑的時候，對石油的用途人們卻絕不會說“石油的和平利用”。同樣的，人們也不會說“鐵的和平利用”。其理由就是，石油和鐵最初就是具有廣泛用途的物質。有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同時也可以用於戰爭的東西。但人們不會一個一個地去說 xx 的軍事利用或是和平利用，只有在原子能上讓人們才說“和平利用”，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專用於軍事的東西。這一用語揭示了原子能“出身的秘密”，即，用於軍事才是原子能本來的利用價值，而“和平利用”、以及作為其中心的用原子爐進行核能發電，其實是原子彈的副產品。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句話的使用，是從 1953 年 12 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在聯合國上所作的知名演講“原子能用於和平（atoms for peace）”開始的，但這一演講的題目本身卻很少被提起。“atoms”本來就是用於戰爭的（for war）。但是今後也可以用於戰爭以外的目的（peace）、可以轉用於本來的目的之外，這一題目正是作為這樣的一個宣言才具有意義。

那時冷戰正酣。蘇聯已於 1949 年擁有了原子彈，並於 1953 年進行了氫彈試驗，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英國也開始獨立研發核武器，並在 1952 年進行了原子彈爆炸實驗。1950 年開始的朝鮮戰爭在 1951 年 6 月差一步就發展為核戰爭，全世界為之震動。在之後的 10 年裡，再加上遠距離導彈的競相開發，冷戰與擴充核軍備的競爭變得日益激烈，人類研製出的核彈頭的破壞力總計達到了足以將全體人類殺死數百次的、Ralph Lapp 說的“over kill”的程度。這自然導致了美國、蘇聯和英國進一步提高了以製造核彈頭為目的的原子爐和濃縮設備的生產能力，超出軍事需要水準的核物質被大量生產出來。但是既然這些兵器無法被消費（既然不能發動核戰爭），那麼不管再怎樣增加核彈頭的儲備、再怎樣開發新型的武器，也是無法無限制地持續進行下去的。而且這個費用必須要由國家的軍事預算來填充。而僅僅靠製造炸彈維持一個生產部門是不可能的。為了能夠維持下去，就必須把原子能賣到什麼地方去才行。武穀三男這樣寫道：

一開始製造的原子爐既笨拙又體形龐大，以製造原子彈所需的鈾為主要的目的，當時建造了很多這樣的原子爐。在初期時，產生的能源被作為麻煩的副產品，被排到了大氣和河川中。原子能受到關注，是在原子彈氫彈的軍備過大、材料生產開始過剩之後。（武穀，p39）

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對民營化的原子能產業的培育。英國和美國開始將軍用原子爐轉用為用於發電的原子爐。艾森豪“和平利用”的提案就是以這種需要為背景提出來的。

艾森豪的“原子能和平利用”是美國在失去了對核武器的壟斷之後、為了使美國生產的濃縮鈾等核物質向國際的轉移置於美國支配的國際機構的管理之下、從而使美國支配世界的一個計畫。也就是說，它是 1950 年代美國霸權的戰略性構成要素——以核戰鬥力為主軸的軍事霸權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回頭重新再看艾森豪在聯合國所作的演講，這是否真的是一個“和平利用”的提案，就顯得越發可疑。在演講的前半部分，是對核武器破壞力的強調和對美國在受到核攻擊時消滅對手的能力的誇示。僅在最後的三分之一的部分，才提到了包括蘇聯在內的“主要相關國”要將核分裂物質的一部分交由新成立的國際機構（IAEA）來管理、以及促進“和平利用”的提案。這是與廢除核武器及核軍縮完全沒有關聯的“和平利用”。這個“和平利用”，從一提案的時候開始，就不折不扣地是軍事利用的附屬品。

在戰後，美國多次提出了意在由處於美國實際支配下的國際機構來進行軍備管理的提案——即通常所說的 Baruch 方案——，但都遭到了蘇聯的否決。這次對於延續了美國一貫意圖的艾森豪提案，蘇聯也是斷然否決。於是在東西方冷戰的條件之下，“和平利用”就採取了東西方圍繞著帶有附帶條件的原子爐建設進行合圍競爭的形式。美國通過在美國的嚴加控制之下提供原子能技術和濃縮鈾的兩國協定，確立了美國主導的原子能利用同盟，而比美國更早（1954 年）地開始了民用原子能開發的蘇聯，也確立了同樣的原子能同盟。“和平利用”的同盟不過是沿著冷戰下兩個帝國的分割線確立的。

到了 1960 年代，隨著法國（1960 年）、中國（1964 年）相繼加入有核國家俱樂部，世界上的核能利用狀況也就必須要能適應這種新的情況。已經擁有核武器的美、蘇（俄）、英、法、中五國開始著手核不擴散體制的建立，以加強幾國的核壟斷，阻止新的核武裝國的出現，並於 1970 年簽訂了核不擴散條約（NPT）。

原子能發電的起步以及與軍事的新聯結

原子能發電也於同一時期走向成熟。在 60 年代中期，“用於發電的輕水爐的訂購迎來了世界性的高峰”，吉岡齊因此認為“以此為起爆劑，原子能發電實現了作為一項產業的起飛。”（吉岡，2011）。但是，真的可以認為原子能發電已經從軍事中獨立出來、成為了一個單純的產業部門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真的成了脫離“軍事利用”的一個普通業務了嗎？

並非如此。原子能發電作為一項產業的確立，並不意味著從軍事中獨立出來。發生改變的，只是產業與軍事這兩個要素的結合樣態。在從出發點的原子彈爆炸到後來的原子能發電這個通路之外，又打開了一個新的通路，即從原子能發電通向原子彈爆炸的通路。NPT 自身就是表明兩者新的結合關係的條約。這一條約在條約締約國之間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作為一項權利加以確認（第 4 條），對於未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禁止其製造和取得核武器（第 2 條），並且為了檢查這些國家是否嚴守規定，作為一項義務，要求非核國家接受 IAEA 的保障措施。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用於發電的原子爐的運轉以及鈾濃縮和用後燃料的再處理、核物質的保管量、儲藏場所等等，這一切都是 IAEA “保障措施”（監察）的對象。也就是把有關原子能發電的“和平利用”的一切，都作為潛在的核武器生產能力來對待。當有轉用於製

造核武器的嫌疑時，就要進行強制監察。從北朝鮮、伊朗的例子來看，由於用於發電等用途的“和平利用”與製造核武器之間的隔斷僅取決於國家的政治性決定，因此這一隔斷可以在任何時候被撤除。這也就是說，原子爐具有不斷的返回原子彈這一起源的遺傳傾向。對於牢牢控制世界的特權的核保有國來說，那些在政治上無法掌控的國家所進行的原子能發電，都是潛在的製造原子彈的能力。NPT 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創立的制度。

這裡嘗試追問的是，如果沒有珍珠港襲擊，沒有曼哈頓計畫，不能製造原子彈，廣島、長崎，不會落下原子彈，現在會有某種的核能發電存在、普及嗎？我對此表示懷疑。無論多麼對利潤敏感的企業會為了發電，想到以如此高的代價與危險入手建設原子反應堆嗎？這一龐大、複雜、精密、昂貴，而又危險的設備卻只是為了將熱水煮沸產生蒸汽，從而使葉輪運轉起來用於發電。這與用煤燒鍋爐的原理沒有什麼差異，正是非常原始的技術想法。的確，這一發電方法對以長時間連續潛水航行為其生命的潛水艇來說，這樣的動力是有意義的。美國 1954 年起大肆宣傳的則是由通用電氣製造的最早的核能潛水艇——鸚鵡螺號中搭載了加重水型原子反應堆。之後作為核能發電的榜樣，宣傳開來。然而商業用的核能發電與鸚鵡螺號的原子反應堆完全不同。不過是給數萬家單位，幾百萬人的日常生活供電而已，為何不得不用這樣複雜、且高成本的燒熱水的熱源呢？何況這發生在 1973 年 OPEC 攻勢之前，英美的石油資本所在的中東支配之下、原油輕鬆入手的時代，為何會有使用核能進行民用發電的必要性呢？原本只有瞬間的大量破壞才能最大限度發揮作用的核裂變技術轉換成最忌諱瞬間大量破壞的民用發電，這一想法無疑最不合理，那有為何毫不費力地為人接受了呢？

我並沒有分析歷史經過，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在戰後初期為實現支配世界的浮躁感充斥著的美國，曼哈頓計畫所提出的原子彈成為了美國永遠繁榮的象徵。我推測，這一“美國的世紀=核能”的心理背後大概也有“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話就會被擊退”這一選擇。

核能發電=原子反應堆的運轉與軍事從 NPT 來看的話，直至現在還有連續性。若是如此，核能發電這一連續性的另一端不受軍事影響不可能——這樣的想法也很自然。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提前確認的是，軍隊的原則在於遵循殺害、破壞、削弱敵人，保存自我的秩序。有效殺死敵人是軍人的本職，為此會把對方的士兵生命看作必要成本來進行計算。對軍人而言，他們必須守護國家這一抽象物，而不是活生生的民眾。軍隊並不關心環境。戰爭恰恰是最大的破壞環境的行為，也從沒有過對環境有利的戰爭。軍隊在作戰中不會修復破壞了的建築。軍人會固守軍事機密，絕不公開核心資訊。

然而，核武器不光在其使用上，甚至從鈾的採掘起，由放射線導致的人的生命與環境的破壞就開始了，從始到終從未改變。在製造開發過程中也好，也是以人的生命與環境的破壞作為前提。進行的核武器試驗的內華達州、新墨西哥、馬歇爾諸島、塞米巴拉金斯克、羅布泊等周圍的居民遭到輻射，儘管縮短壽命，（政府）也不覺羞恥，沒有什麼處罰，甚至讓本國居民注射鈾，進行人體試驗。美國的醫學調查機構 ABCC 為了給下次核戰爭收集生體資料，將廣島與長期的被輻射者當作小白鼠一般來對待，比基尼島氫彈實驗中日本漁民受災時，美國政府首先懷疑漁民是間諜，接著又否認了與實驗的因果關係。這中間蘊含著人與自然關係的某種哲學——將生命工具化，把漠不關心正當化的犬儒主義哲學。

核能發電本身並非軍用，然而其技術與使用形態的哲學難道不是繼承了軍事基因嗎？“和平利用核能”的軍事起源開始的連續性難道不是伴隨著哲學的連續性嗎？尚不知處理廢棄物手段之時來進行核能發電，進行運轉的風格。只追求眼前的破壞，不繼承其社會的、人的結果，從未想過的核電受害者的生活。核能發電以剝削人的生命的前提，這與軍隊以士兵戰死在戰場作為前提組織起來是相通的。核能發電用的鈾的採集不可能與原子彈區分開來，侵蝕著環境與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生活。這種對生活的犬儒主義難道不是核能利用從這一起源繼承而來的嗎？

尤為特別的是對於放射線的態度。讓人難以想像的是日本政府在福島核能發電災害之際，避開了明確說其最高使命在於面對放射線受害“守護居民安全”。政府在持續使居民處於高強度的放射線中之時，還主張“同時對健康沒有影響”，給外部傳出偽資訊。政府直至今日也沒有公開全部資訊。長期經過原子彈、核能發電與放射線這樣眼睛無法看到的有害源，人體會漸漸遭到侵蝕，被殺死。權力對核這一特有的、必須對其加以警惕的一面並沒有多談，而是將其從人們的視野中隱去。這一傾向無論是在原子彈還是核能發電中都能認識到，並不是偶然。

曼哈頓計畫的副負責人法賴爾準將於 1945 年 9 月率陸軍原子彈視察團來到日本，在東京的記者會上對原子彈的射線與熱輻射的威力進行宣傳，並說“未發現有日本報導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輻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彈在經過長時間後未發現由放射線而死亡的案例，廣島現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對放射線的主張只不過是“宣傳”（繁澤，p93）。這與福島原子發電站倒下之後日本政府與核能御用學者的態度有著奇妙的一致性。雙方都對不可無視的放射能無視，或是低估。前者是為了避免戰爭犯罪的罪名，而後者則避免對離開人的控制就出問題的核能根本不能用於發電進行根源上的批判，將政權負荷不了的狀況隱藏起來。法賴爾否定被射線輻射的人群的存在，日本政府則犧牲了民眾的安全。這次政權對核能發電的事故與對東京電力的民眾的態度中看到了與軍隊的相似性人難道只有我嗎？

福島核電站事故以來政府堅守了什麼呢？文科省從未表示過“堅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將規定數值擴大到臭名昭著的 20USV，因為若不如此，福島縣的公共教育則無法維持。這裡優守的是遵守學校制度，而不是活著的孩子，這表明給福島縣居民做的健康調查與過去 ABCC 把原子彈被輻射者當作收集資料物件的“小白鼠”是同樣的態度。

不過在此暫不深入來談，而是回到戰後日本繼續剛才的討論。

美國、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和平利用核能”

美國對戰後日本“和平利用核能”的引入並非只是“為和平的核能”這樣一般性的戰略目標，而是為佔領後的日本開的特殊處方。這一處方 1) 以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進行大量虐殺這一事實為背景，2) 作為舊的敵對國，保證不再與美國二次敵對，3) 利用冷戰最前線的日本作為反攻基地進行利用，不得不回應這一特定的必要。

這一意義上，對日本而言 1954 年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如前所述，這一年的 3 月 1 日，由於美國的比基尼島氫彈實驗，使第五福龍丸遭難，第二天（3 月 2 日），改進黨的中曾根康弘、稻葉修、齊藤憲三、川崎秀二在國會中提交了核能研究開發預算。雖有其偶然性，但兩件事情一直都是帶著內在關聯而展開的。

40 年之後的 1994 年，NHK 從 3 月 16 日起分 3 次放映題為“引入核能發電的腳本——冷戰下的對日核能戰略”的紀錄片節目。這一出色的節目以對政治充滿野心的正力松太郎與美國諜報機關的關係為中心，敏銳地描繪出和平利用核能是怎樣作為對日本的新的心理戰展開的。華盛頓的國家公文檔案館的細緻調查，當時仍在世的美國工作人員，日本內部秘密打聽“接受”濃縮鈾的外務省官僚，通過核能協定與日本政府交涉的美國核能委員會的原國際部長，日本學術會議中和平利用問題的代表武固三男等人，在這部紀錄片中皆有其鮮活的採訪，彌足珍貴。這中間雖包括了眾多重要的證言與觀察，對我印象深刻的則是可以理解面對當時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的高潮而言，美國政府有著怎樣的慌亂與恐懼。

當時經歷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的我所看到的並不是反美運動，人們已瞭解廣島、長崎的慘狀，而且對美國對氫彈試驗與強硬否定責任表示憤怒，因此絕不會是親美運動。從比基尼的“死之灰”中守護孩子的母親們的活動，再到守護海洋、守護魚類的漁民、魚商的活動，進而到佔領下壓抑著的反對原子彈的呼聲的爆發，市井的人們為各種動機（尤其是希望停止

試驗)所驅使,在忐忑不安的生活中對運動進行推進。(藤原,丸浜)

然而,美國當局的眼中看到的則是危險——這給了日本走向反美運動、共產主義的可乘之機。1953 年美國雖“給日本知識份子施以影響,迅速支援有意向的人進行軍備重振,迅速促進日本及其它遠東自由主義諸國互相理解的心理戰——通過快速實施,與中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與反美情感做鬥爭的對日心理作戰計畫。(PSB D-27 1953 年 1 月 30 日)(有馬 pp63-4)。這一心理戰在比基尼事件中遇挫。有馬認為 1954 年比基尼事件引起的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的爆發是“佔領日本結束以來最大的心理戰的完全失敗,是外交上的大污點”(有馬 pp71)。NHK 中常引到的 NSC 檔《美國關於日本的目標與行動方針》中談到“日本對核武器的反應的激烈程度是我們對日關係所有方面的一個要素。太平洋中我們與以上試驗的聯繫,以及核能和平使用開發與美國行動的聯繫中都提出了特定的問題。”這中間有必要對日本心理戰略計畫進行修正。當時負責日本關係的國務副官沃爾塔·巴德遜¹寄給駐日大使約翰·阿裡遜的書信中談到第五福龍丸事件時日本的輿論與日本反美的經過,阿裡遜的報告指出“有必要有更活躍的心理戰計畫,至今為止的心理戰有缺陷”,說明“心理戰計畫的必要性在於對現在共產主義者對日本和平攻勢在加強。”(有馬 p67)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這一新的心理戰計畫的關鍵,而且對讀賣新聞的正力松太郎——代號為“Potam”的 CIA 真正代理人而言,借助這一“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實現其政治野心的捷徑。1955 年,在正力的推動下,通用動力公司總經理約翰·霍普金斯為代表的原子能和平使節團來日,讀賣新聞展開了華麗的報紙宣傳,通過日本電視將這樣的資訊傳向全國,並捲入政界、商界,引起了和平利用的高潮。美國緊接其後,從當年 11 月起介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在東京的日比穀公園吸引了 35 萬觀眾的目光,使日本社會在形象上邁向原子能。而且到第二年,博覽會在全國各地巡展,正如前所述,廣島的原子彈資料館當然也在當時被奪走。

和平利用的幻想

森瀧回想起在廣島召開博覽會的 1956 年,也正是在長崎召開第二次世界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的同一年。這一大會設置了和平利用分會,然而絲毫沒有對“和平利用”加以否定,他還說到,“和平利用”是必須為了民眾的,而非為了獨佔大資本。當時只是有很多這樣的警戒的聲音。“比如義大利代表齊亞薩蒂說為了和平所利用的核能並不能被增加巨大壟斷資本所利用,所有勞動者為了能有更多的食物,更高的生活水準,更好的健康狀況與更穩定的工作狀態,更多的自由與幸福,期望其成為社會共有財產。”

森瀧帶著自責與悔恨寫下了如下的話。

在長崎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會中,新組織起的日本被輻射者團結協會的大會的宣言中加了“給世界的問候”這一副標題。雖是面向世界講述被輻射者的癡心,這一聯結實際則近似於“我們今日在這裡齊聲、高聲向全世界訴說。人類不可重蹈我們所經歷的犧牲與苦難,那只會走向破滅與毀滅的方向,那種放射能決定性地走向人類幸福繁榮的方向,才是我們活著的唯一願望。”然而,寫下這樣草案的只有我。

森瀧就廣島的歷史學家今堀誠二的“核彈氫彈爆炸時代”一書談到,這一觀點“最為鮮明地展現出來”森瀧繼續指出,貫穿其理念主要是“從原子彈氫彈爆炸時代,到核能的時代”。

“通過廢除核彈氫彈,可以更早一日迎來和平利用核能時代。不單不是否定核能,而且將其評價為由於核能的發現,而將人類從自然的制約中解放出來,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轉機。”

“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成為被輻射者,這很重要,這樣的話全人類就不得不意識到都有陸續成

為被輻射者的可能。“被輻射的人不能再增加了。”這樣的說法成為每個人的說法之時，才是原子彈氫彈時代的結束。核能時代的明光之下裹著的薔薇色的黃昏已經近了。（《原子彈氫彈時代》（上）後記）

今堀是廣島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中行動知識份子的核心，也是一位為人敬重的知識份子活動家。我認為《原子彈氫彈時代》是初期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中最優秀的分析之一。當森瀧得知今堀對核能時代予以禮贊之時，表示愕然——“竟然還有今堀！”我也在森瀧的文字中感受到這種感覺。而今堀並不是例外。

毋寧，從戰後的左翼到自由主義進步知識份子，這種關於核能的想法都植根於從社會運動中捕捉到的“常識”——無條件肯定科學技術的發展的近代主義。物理學家雖在軍事利用中表示明確的反對，但在由佔領軍破壞迴旋加速器的屈辱經驗後，期望再次研究的物理學家在 1951 年，要求交涉的講和條約中不包含禁止核能研究（吉岡，1999，p557）。廣島長崎經驗背後的 50 年代中，日本學術會議中對於“和平利用核能”有著強烈抵抗，伏見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抵抗，一度撤回。然而，武穀的方針——原本用於防止軍事利用，推進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開”三原則——立即為學術會議所採用。這中間缺少對潛藏於“和平利用核能”自身核心中與軍事共通的部分的警戒與批判。“核能已是現實問題”，“若不對核能的和平利用給予足夠的注意，就要落後於世界了。”武穀的邏輯是“打破大國獨佔核武器這一科學中的機密體制是小國的任務之一”，“日本那樣被輻射的國家必須採取主導權。”“為此，為了明確分開核武器與和平利用，必須確立原則。”（武穀 p8-9）

出發點——為了核武裝能力，引入核反應爐

然而，眾所周知，戰後日本核反應爐的狀態“和平利用核能”帶來的主要勢力並不是學者，而是前邊所提的正力、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和其背後的勢力。比基尼災害後第二天，眾議院中保守三黨突然共同提交提案，為了建造核反應爐，追加科學技術振興預算 3 億 3500 萬日元，此預算很快通過。中曾根這一讓熱鬧討論的科學家驚愕的突然的動向背後中，有怎樣的動機呢？不可思議的是，中間完全缺少“和平利用”這種觀點。

3 月 4 日眾議院內部會議進行提案主旨說明的是改進黨的小山倉之助，在藤田祐幸來看，這一“主旨說明從開頭就之前的軍事狀況說起，為了處理最新的兵器，有必要進行教育與訓練。為了理解核武器，掌握使用能力，因此將核能預算提上議案。”小山至時還說“我認為，對 MSA 的援助是為了避免借美國舊時的兵器，理解新兵器和現在製造的過程中的某些核武器，此外使用他們的能力是先決條件。”我在讀到藤田的《戰後日本核政策史》（槌田，藤田等，2007）之前，並不知道這一提案主旨使用了讓人震驚的文言。日本最初的原子能預算基於此主旨的說明，而不是“和平利用”，日本核武裝的第一步是引入核反應爐。藤田說“在日本議會以這樣單刀直入說原子能與軍事的問題，（我相信）這是空前絕後。”

中曾根在之後的採訪中說：“對自己核能的關心是源于為缺少資源的日本能源找出解決方式”。他自傳中說，1945 年 8 月 6 日，他作為在高松的海軍主要軍官，看到西邊藍色的天空中飄起了白色的雲，瞭解到那是原子彈爆炸。“即使現在，那種白色煙雲的形象還留在眼底。那時的衝擊是使我走向和平利用核能的動機之一。”然而，中曾根現實中對核能的出發則是在 1953 年美國諜報機關的安排之下來到美國，參加了哈佛大學基辛格主持的 40 天的研討班。很明顯，這是當時美國在世界中展開的親美反共領導培養的一環，研討班中 25 國 45 人聚集一起，連日討論與學習。這次美國行中，中曾根訪問了軍校、大學、滯留美國的日本專家等，積極收集核能有關資訊，對小型核武器開發表現出了興趣，尤其對基辛格之後提倡的沒有內耗地開展核戰爭，只限定於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核戰爭這一概念表現出特別的興

趣。中曾根的“和平利用核能”從最初的改憲、重振軍備、核武裝的劇本中就得到了定位，這一點無可置疑。

1954 年以後的幾年裡，日美核能協議條約（1955 年 11 月），核能基本法等核能三法公佈（1955 年 12 月），正力擔任長官設立核能委員會（1956 年 1 月），正力擔任首位長官設立科學技術辦公室（1956 年 3 月），將東海村選定為核能研究所地點（1956 年 4 月），快速推進日本的“和平利用核能”的體制準備，由 60 年代最初的原子能發電的運作引到 60 年代原子能發電的熱潮。這裡暫不追究其過程。從上述過程中可以知道，“和平利用核能”的引入背後有三點不同性質的動因在起作用，而且可以確認的是，這些動因在深度上持續規定了圍繞核能背後的展開。

這裡三個原因在於 1) 作為美國的霸權戰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尤其是發動日本的反對原子彈氫彈運動的心理戰略的“和平利用”；2) 戰後保守政治勢力邁向改憲核武裝的野心；3) 包含科學家在內的戰後進步的潮流的科學技術進步志向與近代化意識形態。

第三個原因一方面與戰後憲法之下和平民主意識形態相連。其左端是從俄國革命以來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中而來的親近感，在肯定的態度中有著連續性。從整體上來說，這一原因作用在於很大程度上規定了戰後日本“擁抱佔領”（John Dower）的親美環境；2) 是不能採取明確的反美自立路線，3) 是美國的冷戰中霸權支配表現出很強的批判姿態，而對美國蘇聯類型的自然征服型開發模式則是飽含著憧憬，沒有批判。

“和平利用核能”的背後的這三個原因，與我所說的組成戰後日本國家的三個相互矛盾的原則相呼應。即戰後國家自身中插入的 1) 美國的世界霸權支配的原理；2) 戰前日本帝國繼承性的原理；3) 憲法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原理。我前後都在論證戰後日本國家這一歷史的存在可以作為這三個原理，即“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運動來描述，這些自我矛盾的動因典型體現了戰後日本的特徵，有必要理解“和平利用核能”計畫自身內部運作的部分。

將日本放在美國霸權戰略中的主要杠杆並不是作為心理戰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而無疑是根據日美安保條約設定的軍事同盟關係。那是冷戰之下核對抗中美國政策下處於反共最前線的國家的日本與戰後日本社會的關係的代表。而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也是到 1960 年的安保修訂為止所採取的反對核武裝的立場、與安保進行對決。

然而，如我們所知，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圍繞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子試驗、核武裝力的政治立場的決定分裂開來。1961 年蘇聯雖單方停止了核子試驗，召開第七次原子彈氫彈禁止世界大會明明採取了“最初開始核子試驗的政府是和平之敵”的決議，1962 年蘇聯卻再次開始核子試驗，抑制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蘇聯的核是為了和平——共產黨團體對迎向蘇聯的抗議表示反對，進而計畫的中蘇對立的直接影響下，圍繞 1963 年部分核子試驗禁止條約出現對立，1965 年包含總評、社會黨的勢力在“反對任何國家的核子試驗”的口號之下開始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國民會議，運動在組織上分裂為原子彈氫彈協會與原子彈氫彈禁止協會。

從和平運動來看，與原子能發電相關的是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池山）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不光是站在反對所有的國家的核子試驗這一立場，而是調查了被核子試驗輻射的太平洋諸島居民的受害狀況，將視野擴展至核帶來的放射線導致的人與環境的全體破壞。這中間明確對核能發電採取批判態度的森瀧提到“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是從‘核武器的絕對否定’到文字上的‘核的絕對否定’，大約要 7、8 年的時間”，他寫了如下的話。

回來看我們對核的認識的變化，我想關鍵原因大概在於“放射線危害”的認識切實且深刻。核彈爆炸 27 周年大會（1972 年）時喊出“反對引起最大的環境破壞、放射線污染的核能發電與建立再處理工廠”這一口號雖說明我們的核認識已經進展到了這一

程度，在國內的“高度經濟增長”中，環境破壞和污染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同時，也有世界上同年 6 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這一背景。

在國內，尤其有很多反對設置原子能發電的居民運動，有必要有橫向聯繫的全國聯絡會議，有必要做“資訊中心”，並切實看到了學者、專家合作、幫助的必要性。禁止原子彈氫彈國民會議也從今年開始，做好回應這些必要性的準備工作。

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是加深對放射性能源危險的認識，擴展從禁止核武器到反對核能發電這一視野的先驅性和平運動。與此相對立的原子彈氫彈協會則從贊成“和平利用核”的立場，拒絕提出核能發電的問題。一般被理解為和平運動的反核運動的關心重點在核武器上，而原子能發電則著重于抵抗破壞性開發的居民和環境運動這一類居住隔離的課題上。

然而就全體而言，1960 年代開始的運動分裂削弱了日本社會的反核言論和和平運動的力量。而且日本社會強烈的反對情感——“軍事利用”=原子彈氫彈爆炸——也被削弱。將“軍事利用”與“和平利用”對立起來的必然性降低，也不怎麼能聽到“和平利用核能”這一說法。為原子能發電以外的醫療等的“和平利用”以及圍繞巨大的粒子加速器進行的研究則都被歸類到醫學、物理學的活動中，已不再作為“和平利用核能”的一部分來談了。

接著，替代它的“核能發電”作為主人公登場。說起“核能”，腦中首先浮現出核能發電的時代出現了。

核能體制的形成與國家安全保障

正如 1960 年代是全球商業核電作為產業起步的時代，日本的商業核能發電從 1966 年東海村第一號反應堆的啟動以來，於 1970 年代急速地擴張，作為一大國家支柱產業而起步。1970 年代 20 台機組，1980 年代 16 台機組，1990 年代 15 台機組，2000 年代 5 台機組，多年來幾乎是直線型以每年增長 150 萬千瓦小時的幅度在增加。「吉岡 2011」中所言的 50 年代的軍事利用還是和平利用的所謂問題一旦不復存在，核電看上去不僅沒有被擠出國家的能源政策反而被納入了國家的能源政策。

但這是超越能源政策的某種事物的產生。在國家的核心部分中出現了被概括為核能的堅固的構造，吉岡把這種圍繞核能形成的構造稱為“核能體制”。其政策的特徵是“為了維持國家安全保障的基礎，保持國內先進的核技術和核產業的方針”，並為其冠上為國家安全保障的核能的公理之名。在這個前提之上，“在擔任核能開發利用的主管部委的指導下，相關利益方所屬的主管部委，電力部門，政治家和有實力的地方自治體為主要的四個構成成員，在加上生產商及核能研究人員六方構成了複合體，這種複合體是為了制定順應以調整內部利害為基礎的一致意見的政策。吉岡這樣指出。同時指出它等同于軍產複合體或者政、官、財的鐵三角構造。最近“核能村”一詞所代表的正確理解就是指該構造。

吉岡將“為保障國家安全的核能的公理”定義如下（吉岡，2011）。

為了國家安全保障的核能的公理是，日本要控制核武器，但奉行要保持為核武裝的技術面及產業面的潛在能力的方針。這是日本國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據此以擁有核武器為國防安全政策基礎的美日兩國軍事同盟的安全性就有了保障。為了國家安全保障的核能這句話所附帶的意思是，擁有先進的核技術及核產業是國家威信的巨大源泉，即，核能即國家。另外二戰時期日本特有的歷史背景下，此國家國防安全的詞語裡也包含了能源安全保障。對於一般的國民，能源安全的含義被強調。從該公理的觀點來看，核技術中機微核技術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無論如何由於和國防安全保障的密切結合在一起，核能政策在日本是國家基本政策的一部分。

被稱為公理還是很絕妙的。公理是不需要證明的真理，已經被抹殺了要求證明的權利。同時該公理中核能與軍事在戰後的日本以獨特的方式結合的事實被摘選掉，也就是說那是不

以核武器的形式出現的作為軍事要素的核能發電。但是一般上該公理對於一般大眾是以能源政策來提出的。311 以後的東電，政治財經界以及媒體之類核能維護推進派的核能擁護論基本上 100%都以沒有核能的話電能需求是否能被滿足，能源是否夠用等威脅論構成。那是將掩蓋核能體制之實質的掩體的一部分打開，僅僅讓能源的面目露出來給公眾看的手段。從這個角度看，國防安全保障的本來面目就看不到了。

有趣的事情是，這段時間有關核能利用的類似 1954 年核能預算宗旨說明之類的具有露骨的軍事意味的樣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核武裝論在看上去與核能無關的文章中復活了。在解釋憲法的文章中。開端是岸信介。1957 年剛剛執政的岸就在參議院提出在自衛權範圍內擁有核能是可能的。眾議院僅以核武器的名稱就認定是違反憲法的話那樣的憲法解釋是不正確的。通過 1960 年的安保改定，岸信介使日本成了美國霸權戰略的自發加入者。他將憲法修改作為自己的政治使命。成為第一個提出在現行憲法下為國防應持有核武器這一驚人的憲法解釋的首相。這種立場被以後的歷任自民黨政府繼承並反復認定。但是這種立場被剝離核能產業僅僅被放在提出議題的位置，真正面目和名分被分開設計，等待有一天能夠順利融合為一體而被擱置在一起。

作為國防安全保障的核心體制，吉岡的這種視角在 311 以後的今天，不僅把握了事態的整體，也有重要的決定性意義。最近媒體將核能村作為公然批判的對象，那不過是主要將電能產業和于官僚沆瀣一氣的利益集團捉出來，並將核能問題等同於能源問題來論述而已，對於國防安全保障的核心問題連想都沒有想到。戰後，對於日本來說國防安全保障是(1)日美安保得到核保護傘(2)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3)憲法非武裝 9 條與憲法民主主義所言的三要素相互作用而應有的狀態所決定的具體有特有的多元的複雜性的領域。這三個要素與前文提及的戰後日本國家的三原理分別向呼應，但原理上相互矛盾。日本的核力量建設現階段是為了實現(2)被置於實體要素的位置，但是(2)與(1)的相關關係，正是被置於日美安保體制中的微妙關係中。戰後日本構成國家的三大原理中美國的世界戰略原理現在仍舊是壓倒性地強烈發揮作用。日本將自己核武裝化，根據自己的判斷投入兵力即使可能了，也是逆著美國的心願選擇了(2)，這將要求日本的統治集團冒著毫無道理的風險，更何況為了修改憲法所做的重要突破也沒有成功，(2)仍舊在(3)的憲法體制的一定制約下，因此，日本退出 NPT，選擇核武裝的道路是不可避免要招致國際性的孤立的。

這些矛盾的各種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並且其間核能是占了什麼位置，我們接下來討論。

佐藤政權 核武裝名片及其效果

首次將核武裝選擇寫入政策議案的是佐藤榮作首相。佐藤就任的 1964 年到 1972 年的 7 年時間是世界格局特別是亞洲格局發生巨變的時期。這個巨變的時期即是越南戰爭與中蘇對立的時代，“核”也是左右這場巨變戲碼的情節的重要出場人物。

讓我們快速回顧一下。美國 1965 年開始炮轟北越南並向南越南大量增派步兵。戰爭逐漸升級也引起了全世界抗議侵略的反戰運動。另外 1950 年代末開始與蘇聯日漸不和的中國於 1964 年開始核實驗，成為第五個核擁有國。1960 年開始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通過這場激烈的運動來整治全中國。而且核武器不擴散條約(NPT)完成，1968 年最初的 62 個國家簽署了該條約。美國發起的越南侵略戰喪失了 68 年以來的越南春節攻勢在邊境取得勝利的展望，中蘇關係發展到 69 年的珍寶島武力衝突，中國切實感到蘇聯核攻擊的危機。應中美雙方深感必要而實施的 71 年基辛格國務卿秘密訪華及 72 年尼克森總統訪華顯示的中美關係的破冰震驚了世界。戰後國際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這個時期作為首相執政的佐藤，在越南戰爭中明確地支持美國。在日美軍基地成了出擊基地，日本的軍事和民間設施及服務為美軍動員起來，政府開發援助在南越南以及周邊親

美的各國展開。沖繩的美軍基地不得不成為 B52 轟炸機的出擊基地。韓國不僅向越南增派陸軍，也在美國的施壓下不得不接受屈辱的日韓關係正常化。1965 年日本在日韓條約上簽字，以此作為支配韓國經濟的開端，在這期間佐藤也開始和美國交涉關於沖繩回歸的事宜。

這個時期也是日本國內對抗國家權力與既成的社會秩序的叛亂在全國蔓延的劇烈動盪的時代。美國發起的越南侵略戰和反越戰的和平連及新左翼之類的反戰反安保運動，學生的全共鬥運動，女性解放運動及新傷殘人士運動，三裡塚及水吳所代表的地域住民運動等相繼出現，造成了社會的動盪狀況。反對越戰=反對美國的戰爭，成就了這個時代社會的最廣泛的運動基礎，那就是對積極參與到這場戰爭的佐藤政權和支持這種關係的日美安保的批判及抗議的意識的產生。而且在直接全面捲入這場美國戰爭的沖繩，回歸祖國運動打起“無核，回歸本土”，“反戰回歸”的旗幟逼迫遺棄了美國統治下沖繩的日本政府。

在此期間，佐藤首相及其秘密地下令進行核武器製造和核武裝化的研究探討。佐藤內閣打著“沖繩不回歸日本的戰後時代就不能結束”的口號，與詹森政權政權開始交涉，終於在 1972 年根據沖繩協定，實現了沖繩的政權回歸。日本的核武裝在這場交涉中作為影子登場，佐藤 1965 年就任後馬上訪美與詹森總統進行了會談，同一時候的另一個地方，被問到中國擁有核能日本應該如何應對的拉克斯國務卿，佐藤告訴他，日本人認為日本不應持有核能，但是自己作為個人，認為為了對抗中國的核能，日本也應該擁有核武器。在藤田幸佑的文章中，這是佐藤作為日本首相首次將核武裝問題作為外交名片來使用的。因佐藤內閣而起的日本核武裝討論的前前後後也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被新聞揭露，政權交替後過去的驗證環節也開始扭曲且被快速公開。我自己在此期間置身反越戰沖繩回歸問題的運動中，對同時期進行的核武裝過程錯失瞭解的機會表示愕然，不僅僅是我，當時的運動也沒有將這恐怖的過程納入運動的射程之內。

NHK 於 2010 年 10 月 3 日，以 NHK 特別報導“追求核的日本”揭露了當時日本外務省與西德外交部之間就如何從 NPT 蒙混過關進行核武裝的對策進行共同討論，並在箱根進行秘密會談的事情。根據當時外務省當事人的證言，是個相當衝擊的項目。由此倍感壓力的外務省於 11 月將佐藤任命的“外交政策企劃委員會”的 19 年 9 月 25 號的絕密檔“我國的外交政策大綱”及 NHK 報導的受理檔相關的外務省調查約 100 份與核武裝有關的文件公開。這些都是當年佐藤政權對於中國擁有核能及加入 NPT 相關聯的，擁有核能的選擇正面進行檢證的證據。

在此期間，根據佐藤的指示，關於日本核武裝的研究檢證在內閣外務省防衛廳，海上自衛隊幹部中以正式半正式和私下的形式如何被大力推進的，藤田有詳細的敘述。時任國防會議事務局局長的梅原治及防衛廳中層幹部組成的非正式集團“安全保障調查會”的「日本安全保障系列」(朝日新聞)為開端，1967 年到 1970 年間對日本核武裝在技術方面，戰略面，外交面政治方面的可能性進行了探求的研究和提案陸續出臺，日本的安全保障 68 年版中出版的長篇論文《我國核武器生產的潛在能力》中針對日本的核能設施轉型為核武器生產的可能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得出日本若進行核武裝不應利用鈾濃縮製作鈾彈，鈾彈應該是更適合的。為此得出廢料再處理工廠的建設是不可避免的結論。當時針對核武裝研究的多數結論都認為馬上進行核武裝會增加美國的猜疑，但是只要有意識的存在，核能產業的能力為基礎，真正確實擁有核武器將核持有的問題從岸以來的抽象的法律論落實到了製造環節的具體水準。

那麼到目前為止的討論結果，關於核武裝有了如何的結論呢？前述的我國外交政策大綱將關於擁有核能的討論過程以如下短小的公式來歸納了：

關於核武器，無論是否參加 NPT，目前雖然採取了不擁有核武器的政策，在任何時候都保持製造核武器的經濟潛能和技術潛能的同時，也要考慮如何不受牽制。另外關於核武器基礎的政策是基於對於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利害得失的衡量得到的這一宗旨要向國

民進行普及。

這就是任何時候都是以核武器製造的方向所擁有核能的同時，不加入 NPT 或者即使加入 NPT 也能拿出脫離 NPT 束縛的方案，這一立場的宣言。不持有核武器的政策也是限定在“目前”，而且對於國民，是否持有核武器是與利害得失相關的且絕對否決持有核武器也是不可行的這一概念也被灌輸。加入的利害被反復地討論之後，日本於 1970 年簽字加入 NPT，但那時對於條約第十條有：各締約國當與本條約所指物件的事件相關聯的異常事態發生且認定其危害了本國的至高利益時，為行使主權，可以脫離本條約的權利的規定。務必留意政府聲明有特意強調了退出權。批准也是到了 1976 年才被執行。

藤田所指的“核武裝名片”是將該名片公示以後，以目前不擁有核能作為讓步並以“無核三原則”作為保證示人。作為交換使美國承諾沖繩的無核回歸，更利用放棄自主持有核來換取美國對於日本的核傘保護交易之成立，但是實質上並不是這般的好事兒。

如目前為止正式承認所示，對於沖繩交易，因為相互有緊急情況下認可自由將核帶入該區域的秘密約定，所以無核返還沖繩也好，非核三原則也好，一開始就是說說而已。最重要的施政權的返還，是將美國軍事殖民地的管理交付給日本，同時也將沖繩民眾的抵抗處理交由日本政府為目的的。於是 1969 年佐藤尼克森發表共同聲明的時期，對於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近東地區的安全，日本全面對美承諾約定等宣言，對於美國戰略更加忠誠。

但是，雖然這樣對美國曲意奉承，尼克森和基辛格也置日本與不顧，開始開展新的亞洲外交，71 年 7 月基辛格秘訪北京開始到 72 年尼克森訪華，中美和解進程加速。對中國加入聯合國投了忠誠一票的日本卻連告知都沒有，對於日本政府來說無異於迎面一掌。然而日本不僅只是被漠視了，1971 年二次的北京會談中，基辛格與周恩來對於日本都提出了一個共同的認識，即日本的核武裝和在亞洲的再次擴張是應該警戒的，截取刺激的部分內容來看一下。（周恩來與基辛格，pp197-8）

基辛格博士：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衛自己國家的日本對於周邊國家客觀地講已經成為了危險的存在吧？因此我相信日本現在對美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對日本的壓制。因此對於日本我們要相互理解，我們雙方對於日本顯示一種壓制力量是必要的，我們要反對日本的核武裝

周恩來：如果你方並不期待日本的核武器，那麼是為了讓日本威脅他國，你方才提供了和防禦的核傘保護嗎？

基辛格博士：對於假設的狀況解釋起來十分困難，對於由於日本的行為而產生的各種軍事衝突，核傘是適用的這一說法，我個人是持懷疑態度的。我方還是為了自己本國家的安全使用核武器的道理一樣，不是為日本而用也是當然的。但是日本擁有非常迅速製作核武器的能力。

周恩來：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方撤退，根于核能和平利用計畫，日本有足夠的鈾，很簡單就能做出核武器，取代我方撤退的絕不希望是日本的核計畫。對此我們是反對的。

基辛格提出的就是所謂的瓶塞理論。

基辛格訪華聲明一個月以後，尼克森在沒有對日本進行事前告知的情況下停止了美元與金的交換。這是兩個來自尼克森的打擊。自此美國懷疑日本的野心並沒有完全放棄瓶塞論。

核武裝名片應該是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兩個戰略隱蔽—核能與安保

雖然核武裝名片全然無效，但是核能體制還是毫無疑問在這個時期的核武裝大潮中產生了。日本的核能力沿襲了「我國外交政策大綱」的主旨而生根發展。作為未來製造高純度鈾

的專案，反應堆核燃料開發事業團設立於科學技術廳之下，旨在再處理工廠和高速增殖爐技術開發。未來作為核武器搬運手段的機器人技術開發也在科學技術廳下設立，這些都是為了擁有核武器製造的技術面及經濟面的潛力不被識破。核燃料回收計畫也在這個時期提出。這是鈾的開發並非為了製造核彈頭，無論如何都是作為能源政策的一部分在國內外進行宣傳。這樣說，換言之，高速增殖爐也是為了生產高純度鈾的設備，如果連這也要偽裝的話，就有藏頭藏不住尾的感覺了。

如此這般的，作為國家安全保障的核心的核能體制，穿著能源政策的外衣現身，形成了堅固的利益集團，君臨社會。但是，如果一旦成立了，那麼核能發電將不得不實施為社會和產業提供商業能源的供給產業的職能。擁有核武器製造的經濟及技術潛能的核產業，無法改口再說是鈾難道不是為了核彈頭嗎，僅為了躲開這樣的疑問不得不實現核燃料回收的話，技術上無論如何高速增殖爐的建設和運都是不可或缺的。保持核能力不得不可以作為能源政策來整合解釋。但事實上，核燃料迴圈應該關閉的大門遲遲不動，再處理也未能啟動，也沒有核維護的處理處分的相關方案。核能就這樣在作為民營產業成立的條件都欠缺的情況下，雖然原本就沒整理好首尾的所謂軍事共同點的表像出現下，不得不作為國策來推進。核能也不得不繼續被曝光在各種回答不了，也沒有回答的質問之下。

於是對於公民社會的洗腦就成了核產業存在且成立的條件。為了將這種不可能的事情貫徹，就要讓多數市民相信“核能是清潔安全，且便宜的不可或缺的能源，就要將質問封鎖起來，不給質疑任何的機會。為此就有了根據電源法，用交付金將立地地域的社團收買，用錢來封鎖媒體，專家藝人，知識份子的口的必要性了。作為地域壟斷企業，本來沒有廣告費支出的電力公司卻支付著天文數字的廣告費，這個事實自 311 後，東電的廣告費雖已經被終止，但卻被媒體揭露出來。

這種宣傳，不僅僅是單純的掩飾核能對環境，人體的危害，真正想掩飾的是核能存在這一秘密。也就是並非單純作為能源產業而存在這一事實，這是一個巨大的戰略的隱蔽。

另外一個戰略的隱蔽也有必要來關注一下。自民黨政權 1960 年代開始到 70 年代中開展了從日本本土的政治中去掉安保這一爭議點的意識性的政策。日美安保對於戰後政治來說，是核心的政治事件。1950 年代，決定了割讓沖繩的聖法蘭西斯科議和及決定了美軍駐留的第一次安保條約的同意簽署，將國家強行一份為二。然後，議和的領土佔領接受後，以砂川鬥爭為始，積累的反擊鬥爭廣泛開展。作為安保條約違背憲法的伊達判決，甚至引起了美國直接接入最高法院企圖掩蓋這一判決的狀況。甚者，1954 年發生了多數草根民眾行動起來的原水禁運動。1959-1960 年，岸政權反對新安保條約簽署的戰後最大的政治鬥爭開始。甚者激化到美國總統訪日被取消。對於美國，對於把與美國的一體化政治作為支柱的自民黨政府，將這種印象從全國政治中消除是比什麼都要好的上上策。為此，讓民心遠離安保政治是十分必要的，接替岸的池田勇人內閣為此打出收入倍增計畫，由經濟成長帶來的生活品質的上升的美夢將民眾意識中的安保淡化了。

但從國內政治中消除安保最有效的方法是將安保實體，也就是美軍基地從本土轉移到沖繩，新崎盛暉指出在 1960 年的安保修訂於 1972 年的回歸時各自將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大幅縮小與在沖繩的美軍基地的絕對面積或者比例大幅擴大的組合而已。巨大的運動威脅了新安保條約的 1960 年以外，本土的美軍基地減少了 但是在沖繩卻增加了兩倍。1960 年代本土和沖繩的美軍基地面積基本相同，但簽署回歸以後的 1969 年開始，本土的美軍基地驟減到 74 年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形成了美軍基地的四分之三的面積集中在全國面積 0.6% 的沖繩，今天這種局面是夾雜著回歸造成的。（新崎，2005）

由此，60 年代中後期開始到 70 年代初，廣義新左翼的政治鬥爭被鎮壓，且從內部徹底崩壞後，安保在本土的中央政治鬥爭中不再是被追究是否的爭議點，但運動和鬥爭並沒有被

消滅。80 年代作為對美蘇新冷戰激化的反應，數量多且規模大的反核運動又廣泛開展起來，反擊地鬥爭也不屈不撓地繼續開展，海外戰爭時期的海外派兵，新日美安保防衛條約等戰爭參與政策的抗議行動也被組織。但是主流意識裡，安保是不可觸碰的是非，一旦觸碰，會被當做危險人物或過時的人物被孤立的氛圍支配的地位。

說起來安保被強行發配到沖繩，在日本本土幾乎是不存在了，但是相反的，在被強加上基地負擔的沖繩安保去遭到了永存的，激烈的抵抗，1995 年美軍強姦少女案開始勸導的抗議行動，到今天為止沖繩展開的抵抗運動在美國與大和民族兩重殖民地支配的緣由的逼迫的性格急速顯現，由此安保的隱蔽構造上有了深深的裂痕。

無論如何，這個時期，在這兩個戰略性隱蔽的守衛下，安保，沖繩，核能這三要素在強勢的美國霸權系統下被統合到國家安全保障的大綱中，非核三原則加上核密約起到了為這個危險的大綱在國內憲法體制中整合的連結鈕作用。

這三要素的組合方法如下，美國依然將沖繩作為美國可自由使用的軍事殖民地，其管理全權委託給日本，因此免去美國的統治權，日本國將沖繩作為國內殖民地負有基地及沖繩的統治責任，這種組合的交換條件是，美國的戰略系統傘保證保護，且日本在其保護下，保持獨立的核武裝技術與經濟基礎，並可保持自由能力的強化。該構造作為日本國家安全保障的龍骨，在沖繩回歸時被確立下來，而且值得敬仰的是，這些主要內容到今天為止都被維持著。

瓶塞論，誰對誰來用

雖然這樣說，從那之後的 40 年，日本自身的國際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圍繞日本的國際安全保障的環境也在冷戰終結，蘇聯解體，美國反恐戰爭，中美關係由於霸權趨於緊張的變化等成為轉捩點的事件的層出而發生積累的變化。現在我們沒有時間回顧這四十年，在這裡，只對日美關係這一條主線來把問題整理一下。

那是跟瓶塞論有關的主線，換言之，日本與美國在政治軍事方面保持距離，開始走自己的路線時美國的反應，以及對美國反應預測了日本的反應所相關的問題領域。那總是會出現日本核武器的問題。美國對於日本從美國的軌道上走一步都有極為敏感的反應，要採取阻止行動，那時美國將美國對日本的遏制去掉，就會有日本進行核武裝的危險。美國對日本控制的重要性被重申，按照美國的圖紙，日本從美國的核傘下走出去就等同於日本的核武裝，但是現實情況是作為日本政治的主流，完全脫離美國的核傘與獨立的核武裝的有序推進並沒有登場。佐藤政權對核武裝的熱心探求如前述並沒有歸結成為安保廢棄及獨立核武裝項目。

我國外交方針大綱引用核武裝之項前先看一下的文章。

1，關於安保的應施政策

(3)我國輿論的方向基本上是可以預測為傾向於不希望我國國土上有美軍的顯著存在，因此作為我國首先要立足於我國的主體性的安全保障體制，漸進的方式建立起避開急速的現狀變更也是限於這個輿論方向前進未來向利於輿論動向之前的光景之上。

在該場合下，關於我國國土安全，和威懾力及西太平洋上大規模激動還空攻擊力及補給裡要依賴於美國，其他原則上由我國自衛力來實現。關於一朝鮮半島為中心的近東安全，品是作為震懾力向美國提供若干限定的重要基地設施，緊急狀態下這些基地供美軍使用或者幾美軍行動時我國毫無遺憾地提供支援的各種體制的整備為目標。

(4)我國的自我防衛能力要從品質兩個方面調整擴充，再加上國內法制體系的整備，改正及行政的各種體制的充實，保持自我防衛能力的是立足緊急狀態下可以充分發揮作用的措施及由此產生的在日美軍基地逐漸縮小整理，原則上自衛隊要繼續這些的同時，事關日本及韓國國防的有生死存亡重要性的若干美軍基地繼續存在，以發揮威懾力。

大綱所言也就是緊急狀況駐留論，也可以說是修正安保。維持日美安保關係在美國的核傘保護下，減少在日美軍基地，增強自衛隊，相對降低對美國的依賴程度的同時，任何時候都保持製造核武器的能力。借此增加在外交上的震懾力的展望。但是在佐藤政權下，持有核武器的具體能力的得到和擴大的課題直接挑戰並非進先去研究作為和政策而展開的。基辛格周恩來會談時將日本核武裝問題作為現實來討論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佐藤政權的核武裝名片所落之處結果僅停留在保持潛在的核武裝能力上。

佐藤內閣當時關於核武裝名片對美國的回復有些越俎代庖向中國靠攏，基辛格與周恩來會談所言的日本核武裝警戒論，它反映了美國對於日本的這個成對對於日美關係修正的實驗是極為敏感且反應過激的。此時美國對日本的安保破棄賭注的核武裝的本性並不擔心。這個時候表明的中美共同瑞日進行壓制的姿勢將當時作為經濟競爭者抬頭的日本更緊地成為美國手中作為對日恫嚇力氣了作用。

另一方面，對美國而言，安保破棄對美自立的意志且沒反面的日本的和名片等不痛也不癢。基辛格對周恩來講，那是為了人讓美軍駐紮日本去的認可的美國的名片而已。同時從那開始的 40 年之後的 2003 年 1 月，布希總統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說，北朝鮮繼續開發核武器的話，日本的核武器開發就阻止不了了。回憶錄中明顯的這樣揭示(讀賣新聞 2010. 11. 10)日本的核武裝名片，美國不僅向日本用，也向中國用，瓶塞論驚人的長命啊。

無論如何，到這個時期為止，日本的核武裝潛在能力越儲備，日本在軍事上政治上處於更加被美國支配的地位，這一方程式的成立是可以判斷的。

作為這個倒推方程式的關聯，1980 年雷根與中曾根關係應該檢討。開始並不是中曾根而是以國防論被熟知的“專守防衛”論者，鈴木善幸首相的訪美。1981 年訪美與雷根總統會談後鈴木在新聞發表會上稱日美安保條約並非軍事同盟，觸動了美國的逆鱗。鈴木無視已經以海路範圍方隊等誓同美國協力，美國不原諒鈴木，美日關係緊張化。這種緊張顯示了修正後的憲法原理“專守防衛”與美國的霸權原理想衝突。鈴木的繼任中曾根康弘在美國也作為反美的警戒對象。相傳中曾根在選舉運動時將自己作詞作曲的“憲法修改歌”讓後援會的人傳唱。這是一首進行曲調的勇敢的歌。嗚呼，潰不成軍，敵人的軍隊進駐，民主和平的名下，強制的佔領憲法，策劃了國家的解體。只要這憲法存在，只能無條件降服，守著美式憲法，成為美元帥的下臣。以我的分類，這是大日本帝國繼承原理的例子的立場。且與鈴木完全相反，顯示了與美國在原理上是不能合作的姿勢。

但是，就任首相後的中曾根在 1983 年訪美之際，卻易如反掌般地變身成了一名親美戰士。不，也許是不得不如此吧。在記者招待會上，當著雷根的面，中曾根不但宣告“日美命運共同體”，而且稱日本是對蘇最前線上可以不斷射落蘇聯戰鬥機的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艦，一旦發生狀況，日本將封鎖宗谷、津輕、對馬三個海峽，將蘇聯太平洋艦隊圍困在日本海內。當時，美蘇間被稱為“新冷戰”的核對抗已經發展到危險階段，雷根政權強烈要求日本在其對蘇戰略中強化軍事作用。通過積極地回應，誇張地宣示忠誠，中曾根一舉消解了鈴木“脫離美國”和其自身反美民族主義者的“傳聞”。通過極端盡忠建立起來的“羅(納德)康(弘)關係”成為了中曾根最大的政治資產。總之，中曾根的反美言語必須用極端的忠於美國的表現予以補償。

其後，這種制約日美關係的搖擺方程式依舊存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日美關係也面臨著決定性的重要轉折。當時作為反共冷戰產物的日美安保，客觀上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但在日本，很少有借此良機根本性地重新認識日美安保的動向，相反卻是在“國際貢獻”的大義名分下，借助於海灣戰爭中的自衛隊派兵問題，打開了海外派兵的突破口。1993 年非自民黨的細川聯合內閣成立後，細川護熙首相任命朝日啤酒會長樋口廣太郎為主席，組成防衛問題懇談會，重新檢討後冷戰時代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該懇談會提交的報告提出了構築多角安全保障體

系的建議。這一提案主張以日美安保為基軸，推進與亞洲的多角安全保障體制，可以說並不徹底，但即便如此，美國方面也反應激烈，開始全面反撲。

其結果就是 1996 年日美共同聲明作出的“日美安保再定義”，它是對 60 年安保體制的潛在性修改——變更了目的，卻免去了手續。美國的新戰略是，冷戰後繼續維持其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不允許出現任何對抗性霸權，全面守住本國的優勢。因此，美國要求日本對這一新戰略再次表示忠誠。具體表現是，1995 年沖繩全島的反基地鬥爭在決定成敗的緊要關頭遭到拋棄，日美簽訂了決定建設邊野古新基地的 SACO 協定。新日美共同防衛指標規定，不但自衛隊要參加美軍行動，日本基層的社會性、制度性資源也被動員起來，加入該體制之中。以此為突破口，日本在冷戰後一步步地直接加入到了美國的世界戰略中，911 之後，日本參加了布希的反恐戰爭，2005 年的美軍再編又將日本的軍力直接統合到美軍的直接指揮之下。

美國的對日政策，一直存在著對日本脫離美國的警戒心和過度的反應。最近，對於民主黨 2009 年競選公約中提出的“對等的日美關係”的主張、鳩山“將普天間基地移至沖繩縣外、日本國外”的提案、鳩山·小澤的“東亞共同體”論調，美國都明確表示了警戒之意。對鳩山·小澤路線的反彈，在地震·海嘯·核電災難的“朋友作戰”中得到了數倍的增強，鐘擺在相當大的慣性力的作用下向右搖擺。本人並非小澤一郎、鳩山由紀夫的支持者，也不是陰謀史觀者，但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在搞掉小澤、鳩山的過程中，美日的隱在勢力沒有被動員起來。

在“日美同盟”下，美國要求日本效忠的水準之高，出乎常識。可以明確地說，這種維持高要求、高水準的原因，一半在美國，一半在日本支配集團的主流——外務省、財界、政界、媒體。佔領期之後，美國國家維持了與日本國家支配體制之間的有機結合，建立了一個不但可從外部施壓，更可從日本內部確保忠誠的體制。根據佔領期以來的經驗，美國非常清楚，只要不是涉及日本財界利益的經濟問題，大可通過恫嚇手段——只需由“知日派”中級官僚嚇唬嚇唬說“展示你的旗幟（show the flag）”、“軍靴踏在地面上（boots on the ground）”，就可以無限地提高日本的忠誠度。日本方面對美國表現出對日警戒的姿態，抱有深深的恐怖，甚至認為只要是引起美國警戒的行為本身就值得追究。為了消除美國的警戒，甚至不惜過度服務。（奇怪的是很多日本的右翼，如冷戰期反共、蔑視亞洲的右翼由於其出身背景就屬於這種潮流）。正如我反復主張的那樣，戰後日本國家對於美國，不是作為外交對象的外部者，而是作為自身的內部者來對待的。

過去，日本國記憶體在著批判美國·憲法和平民主主義·親社會主義的“革新陣營”這一有力量的反對勢力，與親美·親財界·修憲的“保守陣營”對抗。20 世紀末社會主義崩壞後，這個革新陣營作為陣營消失了，有關國家前進道路的明確的對決戰線也被抹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喪失了以往政治基礎的自民黨被趕下政權，以政權交替本身為目的的民主黨抬頭，並於 2009 年獲取政權。這個黨並沒有統一的政治理念或原則，只是為了有別於自民黨，多少顯示出偏左的姿態，但從整體上還是一個保守主導的政黨，從美·修憲派佔據多數。但目前保守的支配集團還沒有成功修憲，因此還未能擺脫憲法第九條的限制，獲得自由。於是，主流統治者集團，即從美派，就處處挖空憲法第九條的制約，快速地推進著與美國戰略的一體化。

在日本統治集團的內部，確實也存在著主張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的潮流。但是這卻並沒有使統治集團明確地分裂為親美派、反美派之類的政治陣營，而是形成了一種雖然在其內部包含著鷹派與鴿派、靠近美國與靠近中國的傾向差異，但從整體上卻是以美國統治為前提的政治·意識形態體制。這一從美合意體制的存續使美國確定了其判斷基準，即無論怎樣要求抬高忠誠度水準，日本都會順從。作為潛在核武裝的、“為了保障國家安全的核能”，就被編制在這種從美合意體制之中，就像被藏在舞臺兩側而沒有出場機會的小生演員一樣。

那麼，如果這個演員跳到舞臺中央會怎樣？不是潛在，而是現實地成為核持有國又會怎

樣？如果那樣，通過核能發電積蓄的力量將轉化為現實。在理論上，日本確實也存在著放棄安保條約、真心實意地脫離美國自立、退出 NPT 體制、成為一匹狼式的核大國的可能。具有這種意志的政治勢力如果掌權，日本的核能設施和技術將被動員去製造核武器，宇宙開發之中，電子技術也將被重新運用到軍事目的。日本已經擁有了大量的沒有用途的鈾（鈴木 2006）。目前，日本存在著包容這種可能性的氣氛，這也使得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類的人物，可以肆無忌憚地稱“日本如果沒有核是不行的。只要沒有核，就不會被平等對待”、“日本的生存之道是成立軍事政權。如果不那樣，日本就是別人的附屬國。可以進行徵兵制”。從這點考慮，上述情況也不是沒有可能（石原，2010 年 6 月 20 日，憲政會館演講，ANN 新聞 6 月 20 日）。當然，這種選擇意味著日本完完全全的國際孤立——美國、中國、俄羅斯、南北朝鮮、東南亞、歐洲都將鼓勵日本，這是一目了然的。無須贅言，這是一條毫無所獲的破滅之道。而且，歷史上日本有過選擇孤立，導致破滅的教訓。

實際上，這個演員還有一個出場之道。就是日本得到美國認可，或在美國的祝福下進行核武裝。2003 年北朝鮮核武裝意圖明確化之際，美國國內一部分右派政治家就直接提出了為對抗北朝鮮的核武裝，可以承認日本核武的意見。隨著北朝鮮核問題的深刻化，美國國內的“日本核武裝論”此起彼伏。2003 年 3 月 16 日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在電視節目中說，根據北朝鮮核開發的進展情況，日本有可能進行核武裝。《中日新聞》駐華盛頓特派員的報導稱（《中日新聞》2003 年 2 月 18 日）：“麥凱恩議員在接受福克斯電視臺的採訪時說，他對中國已表示過，如果中國不積極地參與到解決北朝鮮核開發問題之中的話，那麼就應該理解日本只有核武裝的路可走。”這是 2008 年總統選舉中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與奧巴馬競爭的麥凱恩的話。美國是對中國打日本核武裝的牌。但換一種解讀，美國的這一態度也包含著美國越過日本，替代日本做出日本需要核武裝的判斷，而且它的意思是，自己理所當然地處於可以下判斷的立場。這就是一幅美國允許日本進行核武裝的構圖。

1960 年安保鬥爭之後，清水幾太郎從反體制派的意識形態專家激變到相反立場，1980 年他出版了《日本！成為國家 核的選擇》一書，其中對“由於在日美軍忙於朝鮮戰爭，自衛隊該怎樣從充當輔助作用的角色成為真正的國家軍隊”提出了建議。建議的核心就是核武裝。當然，清水的核武裝論有一些選擇的空間，（1）即使不成為像法國、中國這樣獨立的核武國家，（2）日本也可擁有核彈頭運輸手段，由美國提供核彈頭（西德方式），（3）或把擁有核運輸手段的美國陸軍部隊招致日本（費用由日本承擔），（4）或由駐軍日本的美國海·空部隊公開承認日本擁核等選項。清水主張：不管選擇哪種手段都是可能的，但必須要修改非核三原則。（清水 pp147-148）。這四個選項是否每一個都可作為日本核武裝的方案而並列，我對此表示懷疑。第（1）選項確實意味著核武裝國家的日本的出現。但是餘下的三個選項，即日本進行核武裝，與清水“日本成為國家”的目標之間有關係嗎？可以實現自衛隊的國家軍隊化嗎？只要得到允許觸核，日本就可以“成為國家”嗎？

再次確認一下吧。至此我們已經看到，對於日本的脫離支配，美國是怎樣神經質般地反應。美國不但要阻止日本的“搖擺”，而且要以此為跳板，進一步地向日本提出比以前更高的效忠要求，在戰略層面夯實對日本的支配。這樣，如果日本進行核武裝，而且是依靠自身的設備和技術，製造、配備核武器，那麼作為對此予以承認的條件，美國將把日本的效忠要求提高到怎樣的水準？洞若觀火的是，美國是要把日本的核，完全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實行完全的統制。這就需要由美國來直接支配日本中樞的政治決定。還有誰會認為美國是將日本看作一個擁有獨立決斷權，進而可以投入核戰能力的同盟國？歷經戰後六十餘年的體驗，我們已經領教夠了日本不是英國這一事實。共同聲明雖然高唱什麼兩國共有價值觀，但誰都明白，美國並沒有信任日本到可由其自己進行核判斷的程度。因此，日本的核武裝，不單軍事上，即使在政治上，也只有把日本完全置於自己的框架內，美國才有可能容許。

在經驗層面，我們已經實證過了除上述路徑別無他途的情況。以最近的事情舉例說，戰

後日本右翼的寵兒安倍晉三，在成為首相後高舉繼承戰前帝國的原理，對修憲發出挑戰，突進到對北朝鮮的對決路線。但結果卻更進一步地深陷美國的手掌之中。這一經過我們都記憶猶新。安倍高呼集體自衛權，投身到“導彈防衛”之中，但這種在日本上空擊落從朝鮮半島、中國飛向美國本土導彈的防衛，卻和日本的防衛毫無關係。這預示著：日本的核衝動，將在現實結果上使日本進一步地加強對美國的從屬地位。

改變前進方向——脫核電與脫安保

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失敗使核能產業觸礁了。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產業，與作為能源產業的核能產業，本來就是一回事。這兩種資格都應該予以解體。目前，日本的核能產業正處於解體過程中，我們應該把解體推進到最後。這種解體並不僅僅停留在作為利益集團的“核能村”解體的階段。現實向我們昭示：戰後日本以美國的核保護傘為依仗，將具有核武器生產能力的核能組裝到安全保障體系中，現在這種體系已經崩壞，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了。

對於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產業，除了極右的論客，主流的政治精英基本上都是閉口不言的。但是，自民黨政調會長石破茂卻在電視節目（電視朝日的《報導站》2011年8月16日）中做出了以下的發言。他應該是311以後從這一角度，公然擁護核能發電的第一位主流政治家吧。

核能發電本來就發端於核潛艇。除日本之外，所有國家的核能政策都與其核政策配套。但是，我也並不認為日本應該擁有核。但同時，日本只要想製造隨時都可造出，一年之內就可造出。這是一種抑止力。那麼，是否應該放棄這種能力，有必要對此進行徹底的討論。我認為不應該放棄。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日本的周邊是俄羅斯、中國、北朝鮮，是美利堅合眾國。撇開是否為同盟國不談，這些環繞著日本的國家全部都是核保有國，而且都擁有彈道導彈技術。對此日本決不應該忘記。

在福島核電站的失敗之後，石破糾纏不放的訴求聽起來是如此空洞。甚至帶有一些戀戀不捨的惜敗的味道。作為抑止力的潛在的核保有能力，究竟是針對誰的，能發揮什麼功能的抑止力？從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以來至今的40年中，實踐已經證明這種抑止力是毫無作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核能不過是石破這樣的軍事分肥集團的護身符。正是這個護身符，可能使日本列島社會面臨滅頂之災——並且近鄰諸國、地球社會整體都有可能受其危害——“繼續維持核能發電群”之類的話，是多麼的荒誕無稽。

實際上，即使沒有福島核電站的失敗，日本國家的“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也因愈演愈烈的內部矛盾而面臨被撕裂的局面。在這一體系下，日本國家（1）依存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但卻對核保護傘只保護美國的利益不絕地感到不安，（2）為此，日本的外交愈來愈為了符合美國的利益而效忠，特別是本國對亞洲的外交，沿襲著美國對亞洲的外交路線而展開，損害了與相鄰亞洲諸國應有的關係，（3）通過大和對沖繩的國內殖民，來支持美國對沖繩的事實上的軍事殖民統治，並越來越與美國的世界·亞洲戰略一體化，（4）在對美不安和“繼承帝國原理”的深層心理下，受大國化衝動的驅使，執著於潛在核武裝能力的獲得與維持，不但使近鄰諸國的不安與日俱增，也為美國的“瓶蓋理論”打下基礎，招致美國不斷提到日本的對美忠誠度要求。而且（5）從一開始就一目了然的是，這種潛在核能力的維持、強化非但對增強日本外交的抑止力毫無作用，（6）相反卻是因在列島沿岸建立核電站之類的核設施，使日本列島處於對外部攻擊極端脆弱的境地。

所以，首先必須承認：福島的狀況標誌著日本發展潛在核能力的核能路線的破產。必須要與包含這一路線的體系完全切斷關係。

當然，核能推動勢力是不會輕易退出的。在各種力量關係的作用下，他們不得不在開發

自然新能源或停建新開核電站專案上做出一定的讓步，但是對於核能力的核心部分，他們還將嚴防死守。他們已經發出了威脅：難道可以停止必要的能源供給，使經濟發展麻痺嗎？他們轉移政治焦點，使擺脫核能不再成為中心議題，把福島危機矮小化處理為局部的、個別性的災害。為了使“國民安心”，搞一些諸如放射能污染處理、心理壓力測試等演出（他們絕口不談“為了國民的安全”），並要強行重開正在停止的核電站。對於這些動向，許多主流媒體不但不從正面進行對決，反倒把這一切當作理所當然，按此方向努力塑造輿論。而且，他們當然要使已經確立的“核能村”整體利益損失最小化。他們中最具政治性的成員，雖然會避開象石坡那樣的直白表現，但依然會用盡一切手段使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體制不要解體。核電推進派將與國際上的核能推進勢力共同合作，展開上述事業，並以此尋求其合法性的根據。

民主黨怎麼樣呢？我已指出，通過 2009 年的政權更替，民主黨繼承了戰後國家的廢墟。民主黨僅以政權更替為唯一目的而結黨，作為一個政黨，非但不具備如何在廢墟之上開展重建的視野、設計、能力，而且其黨內就有很強力的核能推進勢力。只要黨內的擺脫核能勢力沒有作為明確的政策主體發出聲音，那麼民主黨整體就存在著被核能推進勢力拉著走的可能。

但是，現實事態能姑息這樣的收場嗎？日本列島的居民愚蠢到可以被“情況看起來穩定些了”之類的大本營發佈的消息所欺騙的程度了嗎？

當下，列島住民只有以應對核電站殘局的當事人的身份，形成共同的意志，徹底清除核能維持勢力與其遺留下來的接受核電的社會惰性。所謂擺脫核能，是指完全地停止核能發電，處理福島第一核電站危機，取消現在停止運行的核電站的再啟動，將所有的核電站用最大限度安全的方法進行廢爐處理，停止核燃料回收計畫，廢棄核燃料再處理計畫，取消核電出口。而且還要具體明確導致今日事態發生的核能政策的推進者——政財界、大眾傳媒、專家及其組織的責任，令其負擔相應的法律、政治和道義的責任。

同時，要完全分解日本核武裝的“技術性產業性潛在能力”，作出日本將來不進行核武裝的聲明。通過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核能產業實際上是將日美安保、沖繩等編制在內的多元、立體構造中的被掩蓋住的核心問題，它的解體不但關係到能源及環境政策，而且將會喚起對日本對外關係、對內關係的大調整，使日本可以去選擇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至今為止，安保體制通過向沖繩輸出重負得以維持，現在這種隱性體制，也與核電體制一道並行破產了。沖繩的抵抗，通過拒絕大和的國內殖民統治，把日美安保關係的問題再次紮入中央政治，安保、沖繩與核電這兩個問題在深處層面的聯繫被從地下暴露出來，有目共睹。一場有關日本社會整體狀況的嚴峻的政治對決將不可避免。

這要求我們對日本列島社會的未來有一個新的展望。

要確立這個新展望，必不可少的一步即是，通過以對美獨立為原則進行交涉。有必要拋棄選擇美國的核保護傘還是選擇自立=核武裝這樣的業已破產的思考方式。交涉的中心議題之一應該是沖繩美軍基地的解體和美軍的撤退。從普天間基地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至今是美日政府並坐在一方，試圖通過強力，壓迫坐在對面的沖繩。因此，首先要做到放棄這種方式，日本政府要和美國政府隔桌對座，恢復應有的國家外交的方式。而且，沖繩民眾作為握有決定權的當事者，也要參與到這場交涉之中。從整體上看，這一交涉與明治政府的修改條約相似，帶有戰略性性質，因此進行起來絕非易事。這是一種在佔領和戰後期被確立的，已經經歷過了 60 年歲月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到了需要更新的時期。在此必不可少的，是原則性的立場、政治智慧和執著、最重要的是列島民眾的支持。通過這樣的交涉，把日美安保條約修改為日美友好條約的目標可以實現。

目前，現實狀況還是在按照已經破產的模式向前演進。眼下美國正處於通貨緊縮的邊緣，美元體制面臨崩潰，在負債 14.3 兆美元的壓力下不得不巨幅縮減年度財政支出。為了

維護其全球霸權、特別是針對中國的地區霸權，今後，美國將會進一步要求日本增加貢獻（忠誠）。³¹¹ 之後，民主黨政權隱身於政治的混亂與低迷之中，用冒險主義的動態防衛力，取代以往的基礎防衛，在“防衛島嶼”的名目下，站在美國一方，參與到中美有關東海、南海的制海權之爭中，並希望借此之便謀取在尖閣¹等領土、資源問題上的利益。對於不斷高漲的沖繩的自立之聲，民主黨政權不但塞耳不聞，甚至還圖謀將沖繩作為美日面向南方的新的軍事據點。政治軍事的緊張將使今後的道路荊棘密佈。

我們對未來的展望，是非核化、非軍事化。我們希望未來亞洲地區的關係整體上是一種非軍事化的方向，為此要以來自基層——民眾層次——的非戰、非暴力聯合為基礎，使日美關係實現非軍事化——其關鍵就是將美軍徹底從沖繩撤出——，並建構東北亞地區的非核化與多角和平保障關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日本有必要明確自己的立場，即在中美霸權角逐不加入任何一方，通過和平的，而非武力威嚇的手段為解決領土問題找尋新路。

與戰後日本雙重的核依存徹底決裂，面向擺脫核電、擺脫霸權、非軍事化而前行，才是日本走出 311 後國家破產局面的出路所在。

注一 邁克正岡（Mike Masaru Masaoka）是二代日裔美籍人，是日裔美籍人市民同盟的領袖，曾經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強制收容的日裔人與美國政府之間的斡旋工作，提議組建日裔部隊，該提議被採用後，本人又志願加入日裔部隊第 442 連隊戰鬥團，參加過在法國、義大利的戰鬥。戰後作為日裔美籍人士的院外活動人士而活躍。

注二 根據田中利幸發表在《世界》雜誌的論文（田中 2011 p251），我們知道，在戰略立場之外，美國還有一種相對於日本的“正因如此才這樣”邏輯，但並不對稱的核電出口論。該論文稱，1954 年，曾參與曼哈頓計畫的美國科學家鮑爾·波特在視察廣島之後，曾與濱井市長會見，並對其說“廣島因為遭受過核彈災難，所以擁有主張優先享受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而實際上，美國國內已大致具備了接受這一提案的環境”。同年，美國核能委員會委員湯瑪斯·馬來在美國鋼鐵工會大會上提議由美國援助在日本國內興建核電站，其理由就是“在廣島、長崎的記憶還歷歷在目之際，如果能夠在日本這樣的國家建設核電站，不但非常有助於使全體美國人擺脫對兩個城市施加殺傷的記憶，而且符合基督教精神”。日本方面“正因如此才這樣”的反轉是受害體驗者的反轉。與之相對，美國方面的反轉則是加害者感覺的反轉，即通過將加害反轉為恩惠，忘記、埋葬、正當化其加害行為，成為遮斷追究加害責任的工具。美國所謂“投放原子彈挽救了 100 萬人的生命”的公開表態，也是同樣的反轉、遮斷的工具。直到今天，這種帝國的主觀生產工具還在發揮著作用。

注三 沃爾特·羅伯特森在 1953 年是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次官。在與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特使、自由黨政調會長池田勇人的會談中，他承諾美國將援助日本進行再軍備。會談結果就是第二年締結的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MSA 協定）。而且在這次會談中，雙方同意，為了實現日本的再軍備，最重要的是“助長能夠增加日本國民防衛責任感的風氣”，“為了培養日本自發的愛國心和自衛精神，日本政府需要首當其衝地、通過教育、宣傳來承擔責任”，自此，日本政府開始正式介入再軍備和教育內容。

注四 面向 1958 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會，核氫彈禁止運動將“核武裝”列為中心議題，該大會的宣言名為《禁止核武裝宣言》。宣言開篇即指出：“日本正在由核氫彈受害國變為加害國”，“將核武器帶入沖繩和日本本土、自衛隊核武裝、設置核氫彈基地等動向，是與日、韓、台軍事同盟計畫相關的，是以西德為首的世界性核武裝政策的重要的一環”。這裡，還沒有意識到核武裝與已經開始引進的核燃燒爐之間的關係，“禁止核武器”也沒有被置於禁止由本國的核燃料爐生產核彈頭的文脈中。“核武裝”主要是作為沖繩基地的核裝備、美軍

¹ 釣魚島問題，譯者注

將核武器帶入除沖繩之外的日本本土、自衛隊的美國制核導彈裝備等問題來把握的。他們意識中的世界性核武裝政策的範例，是 1957 年西德阿蒂納爾首相提出的西德軍隊核武裝化的提議，與第二年西德議會通過的作為 NATO 軍一環的西德核武裝決議。對此，卡爾·腓德里希·富恩等著名物理科學家發表了《宣言》，發起了波及全德的反對核彈死亡的反對運動。